

第1章

翻译学的主要问题



主要概念

- 笔译和口译的定义
- 翻译实践历史悠久，但翻译学却是一门新兴学科。
- 在学界，翻译以前一直被轻视，只作为一种语言学习活动。
-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长期脱节。
- 翻译研究，通常是文学翻译研究，始于比较文学、翻译“工作坊”和对比分析。
- 詹姆斯·S. 霍姆斯的《翻译学的名与实》被视为这一新学科的“奠基宣言”。
- 翻译学至今已获得巨大发展，常被视作交叉学科。

主要文献

Holmes, James S. (1988b/2004)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awrence Venuti (ed.) (2004),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ition, pp. 180–92.

Jakobson, Roman (1959/2004)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Lawrence Venuti (ed.) (2004),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ition, pp. 138–43.

Snell-Hornby, Mary (2006)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Chapter 1.

van Doorslaer, Luc (2007) ‘Risking conceptual maps’, in Yves Gambier and Luc van Doorslaer (eds) *The Metalanguage of Translation*, special issue of *Target* 19.2: 217–33.

1.1 翻译的概念

本书旨在向读者介绍翻译学的主要概念和模式。由于该领域的研究现在已经相当丰富，本书只能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反映主要的研究趋势。另外，由于篇幅所限，也为了前后一致，本书着重讨论书面翻译而非口头翻译（后者通称为口译或者传译），尽管口笔译两者相通，很难严格区分开来（参见Gile 2004）。¹

英语中**translation**一词大约首见于1340年，²或源自古法语translation一词，或更直接来源于拉丁语*translatio*（传送，即英语transporting），而*translatio*一词则源自其动词*transfere*（传递，即英语to carry over）的过去分词。在语言领域，**translation**一词有几个意思：

- (1) 该学科或现象的通称（I studied translation at university. 我大学修读了翻译。）
- (2) 翻译产品——即翻译出来的文本（They published the Arabic translation of the report. 他们出版了该报告的阿拉伯语译本。）
- (3) 翻译过程，又称**translating**（指翻译服务）。

两种不同语言间的**翻译过程**涉及将用一种语言（源语或SL）写成的文本（原文或ST）转变成用另外一种不同语言（目标语或TL）写成的文本（译文或TT）：

原文（ST）——→ 译文（TT）
源语（SL） 目标语（TL）

所以，当我们将一本操作指南由中文译成英文时，原文是中文，而译文则是英文。这类翻译即是俄裔美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所说的“语际翻译”。雅各布森发表过一篇题为《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的论文，对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翻译分为三类：

- (1) 语内翻译，或称“重述”——将语言符号用相同语言的其他符号翻译；
- (2) 语际翻译，或称“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将语言符号以不同的语言翻译；

(3) 符际翻译, 或称“转换”——将语言符号以非语言符号翻译。

(Jakobson 1959/2004: 139)

这些都是从符号学角度所下的定义。符号学是关于以符号和符号系统进行交际的普通科学, 语言只是诸多符号中的一种 (Cobley 2001, Malmkjær 2001)。这里将符号学用来定义分类翻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翻译并不总局限于语言之间。例如, 在符际翻译中, 书面文本就会译成不同形式的文本, 例如音乐、电影或者绘画。杰夫·韦恩 (Jeff Wayne) 1978年改编的著名音乐剧便是这样的例子。该音乐剧的原作是H. G. 威尔斯 (H. G. Wells) 1898年创作的科幻小说《世界之战》(The War of the Worlds), 该小说后来在2006年经过改编搬上了舞台。另外, 顾伦德·查达哈 (Gurinder Chadha) 2004年将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改编成宝莱坞电影大片《新娘与偏见》(Bride and Prejudice), 则是另一个符际翻译的实例。语内翻译则是以同一种语言摘写或重写原文, 例如重新编写儿童版的百科全书。在同一种语言中, 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也是语内翻译。在下面的例句中, revenue nearly tripled就是对句中前面部分文字的语内翻译, 短语in other words就是具体的标示语。

In the decade before 1989 revenue averaged around [NZ]\$1 billion a year while in the decade after it averaged nearly [NZ]\$3 billion a year — in other words, revenue nearly tripled.³

传统翻译学关注的焦点一直是发生在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语际翻译。然而, 随着本书论述的深入, 特别是第8—10章中, 我们就会看到, “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translation proper) 以及原文和译文的概念已经受到挑战, 我们所说的“翻译”究竟是什么? 它与“改编” (adaptation)、“版本” (version)、“创译” (transcreation, 尤其是对电子游戏和广告的创造性改编, 参见11.1.8) 以及“本地化” (localization, 对文本进行语言和文化的编译, 使之适应新的语境, 参见11.2) 等有何区别, 这是一个切实的问题。桑德拉·霍尔沃森 (Sandra Halverson 1999) 提出可以对翻译进行原型分类, 也就是说, 既有原型翻译, 它具有某些基本的核心特征, 同时还存在处于边

缘位置的其他形式的翻译活动。

大部分翻译理论是以西方的角度撰写的，多源于有关古希腊和拉丁语的研究以及圣经翻译实践（见第2章）。与此相反，玛丽亚·提莫志克（Maria Tymoczko 2005, 2006, 2007: 68-77）专门讨论了其他文化中一些有关“翻译”的迥异词语和比喻，显示了一种不同的概念导向，即并非所有文化中都把词汇层面的忠实视作翻译目标，当然，这些指的都是宗教和文学文本的翻译。例如，在印度，孟加拉语中“翻译”一词是rupantar（意为“变形”），印地语用的是anuvad（意为“仿说”、“尾随”），阿拉伯世界用tarjama（意为“传记”），中国用“翻译”（意为“翻过去”）。每种表达都表明对翻译过程的不同理解，但都预料到了译文的形式与原文相比会发生明显的变化。⁴

1.2 什么是翻译学？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口笔译在人际交流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至少在传达重要的学术和宗教文献方面是如此。随着国际间贸易的增长，翻译的重要性也越发突显出来。据统计，至2008年，仅欧盟（每年的）的口笔译交易额总值就达57亿欧元。⁵然而，翻译研究成为一个学科则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事情。在英语世界里，这一学科现在称为“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这一切要归功于荷兰的美籍学者詹姆斯·S. 霍姆斯（James S. Holmes, 1924-1986）。他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翻译学划定了界限。但该文直到1988年才为人们所熟悉。霍姆斯认为，当时刚刚诞生的翻译学科主要关注的是“围绕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的各种复杂问题”（Holmes 1988b/2004: 181）。1995年，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的专著《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第二版出版，在序言中，她已经提到“翻译学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科所取得的惊人的发展”，以及就此学科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广泛的讨论”（Snell-Hornby 1995, preface）。莫娜·贝克（Mona Baker）在首版《翻译研究百科全书》（Baker and Malmkjær 1998: xiii）的引言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这一令人振奋的、或许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唯一的新兴学科”，认为这一学科内涵丰富，将众多较为传统的研究领域的学者聚到了一起。2008年，再版的《百科全书》便已反映了该学

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评述了“该学科关注的一些新问题，所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多学科性趋势，以及摆脱其欧洲中心学源排外特点的同时并未背离过去数十年所取得的成就”（Baker and Saldanha 2009: xxii）。

翻译学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这些自然也反映了专业翻译实践与通常比较抽象的翻译研究之间的矛盾。首先，随着翻译的需求不断增长，专业口笔译本科和研究生培训课程也壮大了许多。这些培训课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目的主要为培训专业商务口笔译人员，这样的训练常被看作翻译行业的入门资格。以英国为例，学校里学习现代语言的人数在逐渐减少，然而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口笔译研究生课程情形则完全不同。本书2001年首版之时，英国至少有二十多项研究生翻译课程，以及数家指定翻译研究中心。到2010和2011年间，搜索关键词“翻译”，结果显示有二十多个机构提供总共143项相关硕士课程，虽然其中翻译并非是所有课程的核心科目。⁶每个机构讲授的翻译类型也各不相同，包括应用翻译研究、科技翻译、会议口译及双边口译、视听翻译、英国手势语专业翻译以及口述影像等。

文学翻译实践的课程数量则相对较少。在欧洲，欧洲国际文学翻译中心网络（RECIT）支持文学翻译的研究和实践，由此推动文学翻译的发展。⁷第一项课程于1978年设于西德的斯特拉林。

其次，过去数十年间，不同语言的翻译会议、著述和期刊层出不穷。创刊较早的翻译学期刊如Babel（荷兰）和Meta（加拿大）于1955年创刊，随后加拿大的TTR（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édaction）于1988年创刊，接着1989年荷兰又出版了Target，英国1995年出版了The Translator。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期刊，包括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匈牙利），Cadernos de Tradução（巴西），《中国翻译》（中国），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 New Series（比利时），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英国），Palimpsestes（法国），Perspectives（丹麦），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荷兰），《翻译季刊》（香港翻译学会），Translation Studies（英国），Turjuman（摩洛哥）以及Hermeneus, Livius and Sendebar（西班牙）。

网络让一些期刊更广为人知，Meta和TTR杂志的大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网络免费获取，Babel、Target以及The Translator可以通过网络订阅。现在还有单纯为电子版的网络期刊，如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和

New Voices (见www.routledge.com/cw/munday)。此外, 还有一系列的期刊专门刊载单一语种、现代语言、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及其他学科的论文, 但也经常刊载翻译方面的论文。欧洲一些出版公司如Continuum, John Benjamins, Multilingual Matters, Peter Lang, Rodopi, Routledge, 以及St. Jerome过去或现在都出版了翻译学研究系列的书籍。还有各种专业类期刊专门刊载与翻译实践相关的文章。英国有英国皇家特许语言学家协会的The Linguist、口笔译学会的The ITI Bulletin以及由翻译协会出版的偏重文学翻译的In Other Words。

第三, 随着上述出版物数量的增加, 对选集、论文库、百科全书、手册以及入门等各种概论和分析工具书的需求也在增加, 它们的出版数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其中包括Translation Studies (Bassnett 1980/1991/2002)、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Gentzler 1993, 2001),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aker and Malmkjær 1998; Baker and Saldanha 2009),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uttleworth and Cowie 1997),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Munday 2001/2008),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Kuhiwczak and Littau 2007),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Munday 2009), Critical Concepts: Translation Studies (Baker 2009), Critical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Baker 2010),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Pym 2011), th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Gambier and van Doorslaer 2010) 以及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lmkjær and Windle 2011)。大家最熟悉的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 (John Benjamins),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s (St Jerome) 以及完全免费的BITRA (阿利坎特大学提供) 都可以在线搜索。⁸

第四, 国际组织也迅速壮大。国际翻译联合会 (The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 FIT, 简称国际译联) 是由法国翻译学会及其主席皮埃尔·弗朗索瓦·卡依莱 (Pierre-Francois Caillé) 于1953年成立的, 将各国的翻译协会集合到了一起。近年来, 翻译学者聚到一起, 形成了各种全国性或国际性组织, 如加拿大翻译学协会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 Association canadienne de traductologie, 缩写为CATS, 1987年成立于渥太华)、欧洲翻译学会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缩写为EST, 1992年成立于维也纳)、欧洲视听翻译研究协会,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in Screen Translation, 缩写为ESIST, 1995年成立于卡迪夫)、美国口笔译研究协会 (America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 缩写为ATISA, 2002年成立于俄亥俄州肯特), 以及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缩写为IATIS, 2004年成立于韩国)。国际会议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 且议题广泛。20世纪80年代初, 翻译学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仍是一股静流, 如今已变成最活跃、并不断发展变化的研究领域之一, 研究路径也各不相同, 令人感到振奋。

1.3 翻译学早期历史

有关翻译的记述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翻译实践在文化与宗教的文本和概念的早期传播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西方, 多位学者曾就翻译方法问题展开讨论, 其中包括西塞罗 (Cicero) 和贺拉斯 (Horace) (公元前1世纪), 以及圣哲罗姆 (St. Jerome) (4世纪)。正如本书第2章所述, 他们的思想直到20世纪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以圣哲罗姆为例, 他将《圣经》的《七十子希腊译本》译成拉丁语, 影响了后世《圣经》的翻译。事实上, 在西欧, 前后一千多年, 特别是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 圣经翻译一直是不同意识形态冲突的战场。在中国, 佛经的翻译从1世纪起就揭开了此后多年关于翻译实践的讨论。

虽然翻译实践历史悠久, 但翻译研究到20世纪后半叶才发展成一门学科, 在此之前, 翻译往往仅被视作语言学习的一部分。确切地说, 自18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及后来, 许多国家中学的语言学习一直沿用所谓的语法翻译法 (Cook 2010: 9-15)。这种方法起初用于学习古典拉丁语, 后来用于现代外语的学习, 强调对语法规则和句型结构的死记硬背, 再通过翻译句子来练习和测试。这些句子通常是专门设计的, 仅用来体现所学的语言结构, 彼此间毫无关联。这种方法至今仍在一些语境中使用, 下面这些英语—西班牙语句子翻译练习可谓典型。所有句子都非常奇怪, 完全脱离语境, 而目的是为了练习西班牙语时态的用法。这些句子摘自K. 梅森 (K. Mason) 编著的《高级西班牙语教程》(Advanced Spanish Course), 直到上世纪90年代, 这本教材仍然在英国一些中学使用:

(1) The castle stood out against the cloudless sky.

(城堡矗立在无云的天空下。)

(2) The peasants enjoyed their weekly visits to the market.

(农民很喜欢每周赶集。)

(3) She usually dusted the bedrooms after breakfast.

(她通常吃过早餐后打扫卧室。)

(4) Mrs Evans taught French at the local grammar school.

(Evans 太太在当地文法学校教法语。)

(Mason 1969/1974: 92)

翻译与语言教学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学术界轻视翻译。翻译练习被视作学习新语言的途径，或者作为在尚未能阅读原文之前阅读外语文本的方法。故此，自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来 (Cook 2010: 6-9, 22-26)，尤其在一些英语国家，随着直接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的兴起，语法翻译法越来越遭人诟病。交际教学法强调学生学习语言的本能，努力在课堂复制“真实”的语言学习环境。该方法往往更侧重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而非笔头表达能力，至少教学早期如此。而且一般避免使用学生的母语，结果，语言学习完全抛弃了翻译。自此，就教学而言，翻译更多地局限于高级和大学语言课程，或者专业的翻译培训，只是到近年来才在语言教学中重新使用翻译（例如 Cook 2010: 125-53）。

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自爱荷华和普林斯顿开始，翻译工作坊的概念促进了文学翻译。这一概念源自20年代剑桥文学评论家I. A. 理查兹举办的阅读和实用批评工作坊，以及后来的创意写作工作坊。翻译工作坊主要为了向目标语文化引进新的译作，并对翻译过程中以及解读文本时的一些细致原则展开讨论。⁹同样促进文学翻译的还有比较文学，对文学进行跨国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当然也就需要研读一些翻译作品。

翻译也是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该学科主要针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试图找出两者间的一般和特殊差异。自上世纪30年代起，对比语言学在美国发展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60年代和70年代为其鼎盛时期。翻译作品及翻译实例为这些研究（例如，Di Pietro 1971，James 1980 及后来的Connor 1996）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这种对比的方法虽然没有融合社会文化和语用元

素，也没有充分吸收翻译作为交际行为的思想，但它对一些重要的语言学翻译研究，如维奈和达贝尔内（Vinay and Darbelnet 1958）及卡特福德（Catford 1985）的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长期以来，翻译学研究一直沿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本身就表明语言学与翻译之间显然存在着固有的联系。在所采取的具体模式中，有生成语法、功能语言学以及语用学（见第3—6章）。

更具系统性的语言学方法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开始出现，其中一些研究如今已经成为经典，例如：

- 维奈和达贝尔内合作出版了《法英比较文体学》（*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1958），对英语和法语进行对比，首次提出用于描述翻译的一些关键性术语。这部著作1995年才译成英语。
- 阿尔弗雷德·马尔布朗（Alfred Malblanc 1944/1963）针对英语和德语翻译作了同样的研究。
- 乔治·穆南（George Mounin）出版的《翻译的理论问题》（*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1963）探讨了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 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1964a）吸收了乔姆斯基当年非常时髦的生成语法，作为其著作的理论基础。他的这些著作最初是作为指导圣经译者的翻译指南。

这种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始标示出翻译的“科学”研究领域。奈达1964年出版的专著《翻译科学探索》（*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a）在书名中使用了“科学”这个词。相对应地，在德语中，萨尔布吕肯的萨尔兰大学的沃尔弗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在教学和科研中也使用了翻译科学（*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这个概念。另外，海德堡的温拿·科勒（Werner Koller）、奥托·凯德（Otto Kade）和阿尔布特·纽伯特（Albert Neubert）等非常活跃的莱比锡学派学者都采用了这个词。当时，这个刚刚出现的学科名称尚未确定，也有学者建议用其他一些名称，如*translatology*，以及该词的德语对应词*Translatologie*，法语对应词*traductologie*，以及西班牙语对应词*traductología*（如Vázquez-Ayora 1997，以及有突出贡献的Hurtado Albir 2001）。

1.4 霍姆斯/图里的“翻译学结构图”

翻译学在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过程中，詹姆斯·霍姆斯的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影响深远 (Holmes 1988b/2004)。据根茨勒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Gentzler 2001: 93) 中描述，“大家普遍认为霍姆斯的论文是该学科的奠基之作。”斯内尔-霍恩比 (Snell-Hornby 2006: 3) 也持相同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述，该学科多由其他学科演变而来，霍姆斯最终出版的论文却是其1972年会议演讲稿的扩充版，他正是在哥本哈根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翻译分会场发表的演讲。霍姆斯指出了当时这个学科所面临的局限，因为当时的翻译研究全部散见于一些更古老的学科 (语言、语言学等)，没有自己的家。他还强调要建立“其他的沟通渠道，冲破传统学科，将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组织起来，不论他们来自什么背景” (Holmes 1988b/2004: 181)。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霍姆斯提出了一个整体框架，描绘了翻译学的范围，而这个框架后来由以色列著名翻译学者图里 (Gideon Toury) 以下图呈现出来 (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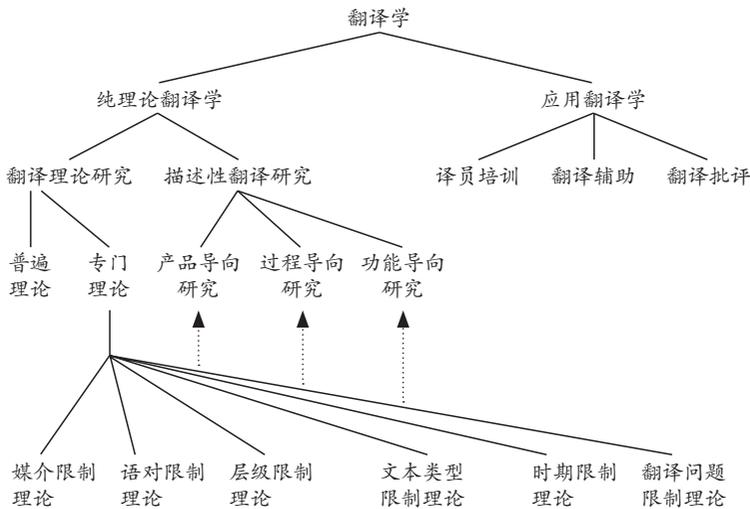


图1.1 霍姆斯的翻译学结构图 (from Toury 1995: 10)

霍姆斯对这个框架作了如下解释 (Holmes 1988b/2004: 184-90)，**纯理论翻译学**的目标是 (1) 描述翻译现象；(2) 确立普遍原则，解释和预测这

些现象（翻译理论）。”“理论研究”分支又分为普遍理论及专门理论，根据霍姆斯，“普遍理论”是指试图描述或解释各种翻译活动，并且归纳出适用于所有翻译的理论（例如图里的翻译“法则”，见第7章）。“专门理论”的适用性则取决于下文所讨论的参考因素（媒介、文本类型等）。

霍姆斯图中“纯理论翻译学”的描述分支就是所谓的“描述性翻译研究”（DTS，见第7章），可以考察：（1）翻译作品；（2）翻译功能；以及（3）翻译过程。

- （1）产品导向研究考察现成的翻译作品。可以对单一原文—译文文本对进行描述或分析，也可以对同一原文的多个（同一语言或不同语言）译文进行比较分析。这种小型研究可以累积成大量的翻译分析，考察特定的翻译时期、语言或者文本/语篇。例如21世纪的英汉互译，或者21世纪科技报告的翻译。稍大型的研究可以作历时研究（追踪发展的过程），也可以作共时研究（专注某个时间点或时段）。霍姆斯（同上：185）预测“产品导向研究的目标之一或许是一部翻译通史——尽管这一目标现在显得过于庞大”。
- （2）功能导向研究，霍姆斯（同上）指的是描述“译文在目标语社会文化中的功能：重点在语境而非文本”。可以研究的问题包括：翻译了哪些文本，何时何地翻译的，产生了何种效果。例如，可以研究莎士比亚在欧洲语言中的翻译与接受问题，或者研究当代动漫电影的阿拉伯语字幕翻译问题。霍姆斯把这个领域的研究称作“社会翻译研究”，现在可能称作翻译社会学或翻译历史学。霍姆斯发表他的论文时该领域的研究还较少，但在当今翻译学研究中却是个比较热门的研究问题。（见第8章和第9章）
- （3）过程导向研究在霍姆斯的框架中关注的是翻译的心理学问题，即译者大脑的思维活动，这种认知角度的翻译过程研究包括有声思维研究（译者一边翻译，一边说出大脑所想，并全部录制下来）。近年的研究采用了诸如视线跟踪等新的科技，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现代是如何实现该领域更为系统的分析方法的（见4.4）。

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结果可以支持理论翻译研究，衍生出普遍理论，或者更有可能衍生出针对各种翻译限制的专门理论，具体分类见图1.1。

- **媒介限制理论**可以细分为机器翻译或人工翻译。机器翻译再细分为完全由机器/计算机完成翻译（机器翻译/自动翻译）或者由机器/计算机辅助人工完成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缩写为CAT）。人工翻译再细分为笔译和口译，而口译又可分为交替口译和同声口译。
- **语对限制理论**局限于某些或某种特别的语言和文化。霍姆斯提出语对限制理论（如英语与日语）与对比语言学和文体学关系密切。
- **层级限制理论**是限于某个层级，通常是单词或句子层面的语言学理论。霍姆斯写作其论文时，篇章语言学，即篇章层面的语言分析已经崭露头角，这种方法今天已经变得非常流行（见本书第5章和第6章）。
- **文本类型限制理论**专注话语类型与体裁，例如文学、商业和科技翻译。文本类型翻译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主要倡导人有赖斯和弗米尔（见第5章）。
- **时期限制理论**，顾名思义，是指特定时间段和特定时期的翻译理论和作品，翻译史就属于这个范畴。
- **翻译问题限制理论**可以指某些特定的问题，例如“对等”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突出的问题），或者是否存在所谓的“翻译共性”的问题。

尽管霍姆斯作出了上述分类，他一再强调不同的理论可以同时起作用。因此，本书第2章中分析的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小说的新版英译本的前言就属于语对限制理论（限于巴黎法语英译的问题）的范畴，又属于文本类型限制理论（小说的前言）范畴，还属于时间限制理论范畴（1981–2003）。

霍姆斯框架中的“应用翻译学”分支主要是指与翻译实践相关的应用研究，包括：

- **译员培训**：教学法、测试技巧、课程设置；
- **翻译辅助**：如词典和语法书；
- **翻译批评**：对译作所作的评估，包括对学生作业的批改以及对正式出版译作的评论。

霍姆斯还提到另一个领域，即**翻译政策**，他认为翻译学研究者可以帮助确定翻译的社会地位。这包括翻译在语言教学课程设置中是否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则占据怎样的位置。

这个翻译学框架也存在问题，结构图中的总体分类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只是人为的分类，霍姆斯自己也指出，翻译理论研究、描述性翻译研究、应用翻译学彼此并不孤立。但正如图里所述 (Toury 1991: 180, 1995: 9)，这样分类的最大好处是对翻译研究的不同领域的工作进行清晰的划分，而在这之前它们的关系一直都模糊不清。图里的分类还是具备相当的灵活性的，能将该学科的最新发展，如近年的翻译技术的进步，吸收进来 (见第11章)。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图1.1，我们就会发现应用翻译学分支没有充分展开，然而展开并不困难，如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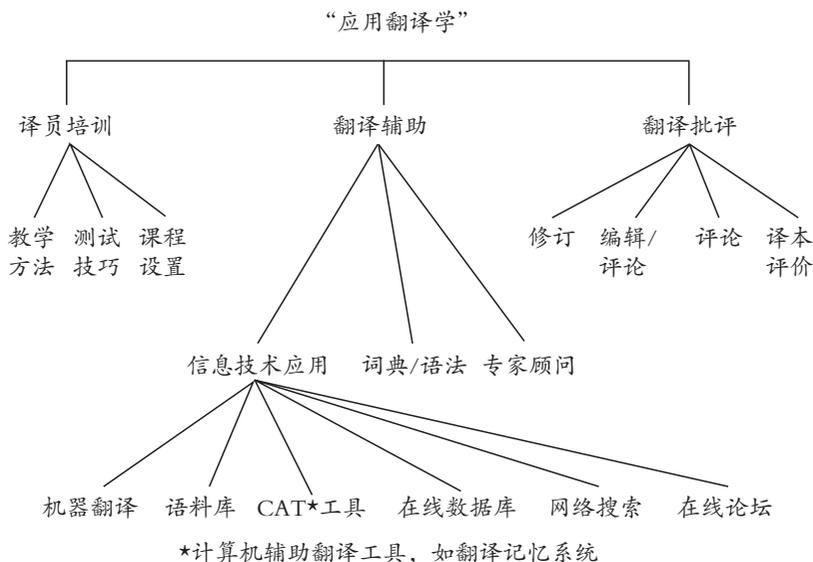


图1.2 应用翻译学

上图中我们保留了原来的分类，但补充了一些细节，鉴于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CAT工具) 和自动翻译的普及，我们特别补充了翻译辅助部分。霍姆斯的论文也许已经过时，但其重要性在于阐述了翻译学的全部潜能。这个结构图仍然经常作为许多研究的起点，尽管其后的理论研究都尝试改进其中部分内容 (如Pym 1998, Hatim and Munday 2004, Snell-Hornby 2006, van Doorslaer 2007, 本书稍后将会涉及)。另外，当今的研究已经完全改变了1972年翻译学的立足点。霍姆斯花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阐述翻译理论研

究和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纯理论”方面的内容，这显然表明了他的研究兴趣，但并不表示应用翻译学缺乏发展的潜能。“翻译政策”如今更多与决定翻译的意识形态相关联，包括语言政策和霸权相关，而非霍姆斯当年描述的情形。如图1.1所示，图里对描述性翻译研究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分支的进一步分类完全可以增加语篇以及文本类型。但人工翻译下面增加口译也许会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尽管口笔译不可避免有重叠的地方，但考虑到口译的要求和性质与笔译完全不同，最妥当的做法还是将口译与人工翻译并列，列作“口译研究”（Pöchhacker 2004, 2009）。视听翻译（Diaz Cintas and Remael 2007）和手势语翻译或许也可以用类似的分类方法处理。此外，正如皮姆所指出的那样（Pym 1998: 4），霍姆斯的图表没有涉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个人风格、决策过程以及工作方法，而这正是霍姆斯作为文学翻译家同时又是翻译研究者致力克服的问题，即理论与实践分离的问题。

1.5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学发展迅速，霍姆斯图中所描绘的许多领域都突显出来。对比语言学一度受到了冷落，但由于语料库翻译研究取得的成就（见第11章），又重新受到关注。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科学”在德国仍然异常兴盛，但与之紧密相关的对等概念受到了质疑，并不断更新（见第3章）。德国兴起了围绕文本类型和目的的翻译理论（见第5章赖斯和弗米尔的目的论）。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将语言看作是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交际行为，这一理论及其关于话语分析的学说在90年代初期对翻译的影响特别明显。尤其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多位学者将其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如贝尔（Bell 1991）、贝克（1992/2011）、哈蒂姆和梅森（Hatim & Mason 1990, 1997）、卡尔扎达·佩雷斯（Calzada Pérez 2007）、芒迪（Munday 2008）（见第6章）。70年代末至80年代，源于比较文学和俄国形式主义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开始兴起（见第7章）。特拉维夫是开创此研究的中心，在这里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和图里倡导文学多元系统的理论，该理论强调不同文学和体裁之间，包括翻译文学和非翻译文学可相互竞争，争取主导地位。这些多元系统学者与比利时的一个研究小组紧密合作，包括何塞·朗贝尔（Jose Lambert）和已故的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同时与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西奥·赫尔曼斯（Theo Hermans）联系也很密切。其中一部

重要文集是由赫尔曼斯编著的《文学的操纵：文学翻译研究》(Hermans 1985a)，因此才有了“操纵学派”这个名称。后来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共同编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Bassnett and Lefevere 1990)又引入了“文化转向”一词，这个动态的、以文化为导向的研究路径主导了之后十年的翻译研究(见第8章)。

90年代出现了一批崭新的研究方法和概念，包括以雪莉·西蒙(Sherry Simon)为领军人物的加拿大翻译与性别研究、埃尔斯·维埃拉(Else Vieira)倡导的巴西食人主义学派、杰出的孟加拉学者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推动的后殖民翻译理论(见第8章)。在美国，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从文化研究角度分析翻译，呼吁更加彰显译者身份，认可译者的贡献。进入新千禧年以后翻译学发展的速度就更快了，而且特别关注下列问题，翻译、全球化和抵制的问题(Cronin 2003, Baker 2006)，翻译社会学和翻译历史学(如Inghilleri 2005a, Wolf and Fukari 2007)，翻译培训(如Kearns 2008)，以及过程导向的研究(如O'Brien 2011；参见本书第4章)。新科技给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都带来了革命性变化，这包括视听翻译、本地化以及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等新领域的出现(见第11章)。此外，翻译学也扩展到许多其他国家，尤以中国(如Chan 2004, Cheung 2006, 2009)和阿拉伯世界(Selim 2009)为最甚。

1.6 范·道斯莱尔的“翻译学结构图”

正如范·道斯莱尔(van Doorslaer 2007)所述，为了适应翻译学不断扩展的需要，Benjamins出版的《翻译学书目》(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采用了一套新的概念框架。新的翻译学结构图中把“翻译”与“翻译学”区分开来，以反映不同的研究重点。¹⁰“翻译”关注翻译活动，在新的结构图(van Doorslaer 2007: 223)中分为：

- 语言模式(语际、语内)
- 媒介(纸质、视听、电子)
- 模式(隐性/显性翻译，直接/间接翻译，母语/非母语翻译，伪译，重译，自译，视译等)；
- 领域(政治、新闻、技术、文学、宗教、科学、商业)。

翻译学（同上：228-31）细分为：

- 路径（例如文化路径、语言学路径）；
- 理论（例如翻译普遍理论、多元系统理论）；
- 研究方法（例如描述方法、实证方法）；
- 应用翻译研究（翻译批评、教学法、制度环境）

除此之外，还有一张由术语构成的“基本转换图”（同上：226），用来描述翻译转换过程的语言策略。虽然文化转向非常流行，但这些语言层面的转换活动仍然是具体翻译实践过程的核心。这包括翻译策略、技法、“错误”、规则/规范/惯例/法则/共性，以及各种翻译工具。图1.3、1.4展示了“策略”和“技法”的分类图。尽管文献中有时对两者的区别不甚清楚，这样的区分还是非常重要的。策略指的是译作的整体翻译策略（如直译，见第2章），而“技法”则是指在处理文本中某一点时所采取的具体技巧（如借词、仿造，见第4章）。

当然，语言转换还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以及具体的制度环境里发生的，因此仍然要受到相应的制约。

1.7 学科、跨学科还是多学科？

近年来翻译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跨学科性，本书第一版结尾讨论的是翻译学作为一个学科、跨学科或是次学科的问题，并且指出其未来在于其跨学科性。我们还讨论了跨学科性的本质，提到维拉德·麦卡提（Willard McCarty）的论文《作为跨学科的人文计算机技术》（Humanities computing as interdiscipline, 1999），¹¹他是这样描述跨学科在学术界的作用的：

现今世界各学科彼此界限分明，除了由于人们信奉学科划分标准所带来的阻碍，要真正理解、资助或者管理真正的跨学科依旧不容易……跨学科在现存领域的隙缝中生存，并与其中一些、许多或者全部领域发生关系。它是一位在定居民族中生活的腓尼基商人。它在这世上的存在是个谜，而这个谜题激励我们重新思考该如何组织知识和对它进行分类。

（McCarty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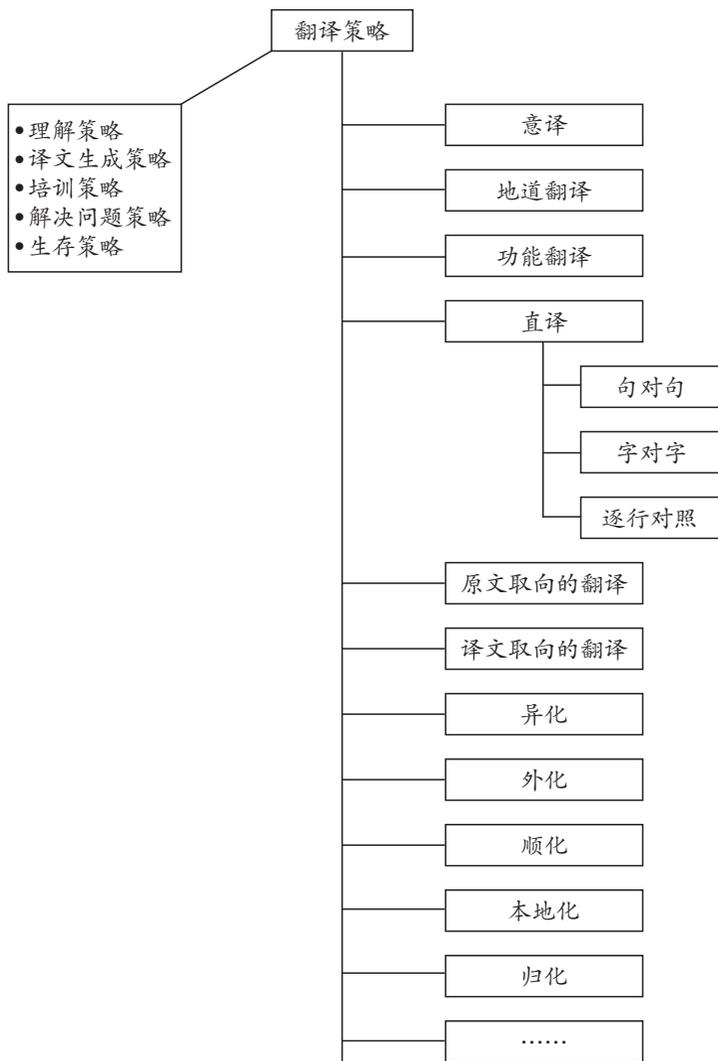


图1.3 翻译策略（依据van Doorslaer 2007: 226）

跨学科研究可以推动和回应不同学科知识和技术之间的联系，并以此挑战现行的传统思维方法。麦卡提把学科体系看作是一个系统序列，认为“传统”学科与新兴的跨学科之间存在着“主要”或者“次要”的关系。对我们而言，翻译学就是生活在一些相对来讲较为成熟学科中间的腓尼基商人，完全有可能与下列学科构建“主要”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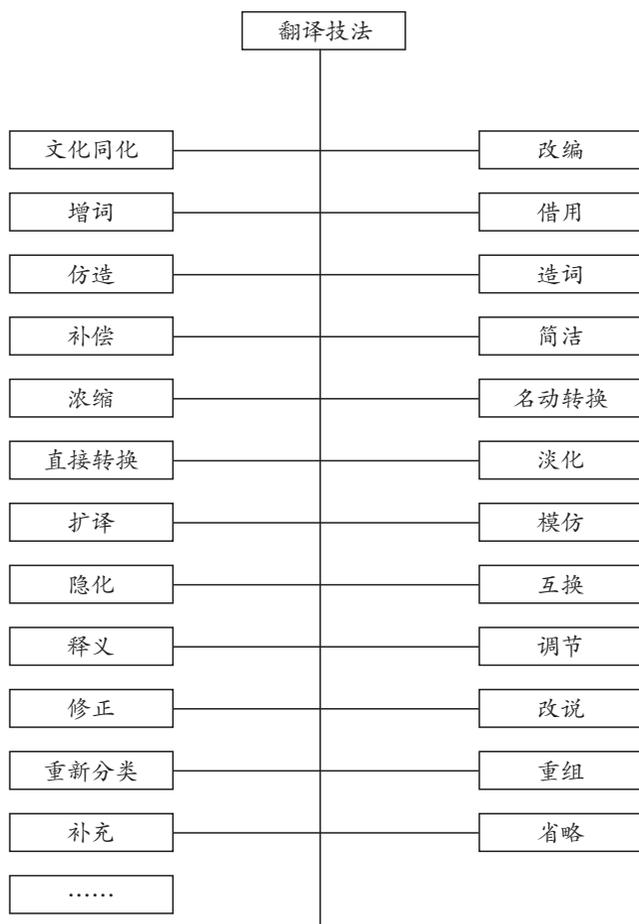


图1.4 翻译技法（依据van Doorslaer 2007: 227）

- 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语用学、应用和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 现代语言和语言研究；
- 比较文学；
- 文化研究（包括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研究）；
- 哲学（与语言和意义相关的哲学，包括阐释学、解构主义及伦理学）。

而且,近年来,翻译学与社会学、历史学及创意写作都构建了“主要”关系。现今一些项目更具有多学科性,由不同学科(包括翻译学)的研究者共同参加。

值得注意的是,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正好说明了多年来翻译学所经历的变化。60年代翻译学与语言学联系紧密,而到现今更侧重文化研究视角,近几年又转向语料库翻译研究和视听翻译。至于应用翻译学部分,如译员培训,与其他学科之间呈现的是“次要”的关系。例如,专业翻译课程需要教授学生拟从事的翻译领域的专业知识,如法律、政治、医学、金融、科学,以及不断增加信息科技的分量,教授CAT翻译。

随着关于跨学科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如Ferreira Duarte et al. 2006),有些学者如丹尼尔·吉尔(Daniel Gile)却认为这会给翻译学带来威胁:

翻译学与其他学科建立的合作关系一直都是不平衡的:地位、权力、财政支持以及实际的研究能力大多由其他学科占有。此外,跨学科性还会进一步推动范式扩张,因此,可能更加削弱[翻译研究]和[口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

(Gile 2004: 291)

翻译学在某些地方确实沦为了语言系的“殖民地”。一方面他们看到翻译教学作为学术教学课程的价值,并为之所吸引,但另一方面私下里又对翻译抱有偏见。讽刺的是,这更加剧了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人为造成的距离。例如,英国的科研评估(由校外机构对个人和系科的科研出版进行审核和评估)一直都看重学术论文,轻视翻译,哪怕是译著。这实际上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翻译实践对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师来说都是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实践经验。

然而,翻译学最惊人的发展还是不断涌现出来的崭新视角,每一种视角都在试图建立新的研究范式。这却引起另一场争论,在这个日渐零碎的翻译学学科中,它的“共同领域”究竟是什么。切斯特曼和阿罗约(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随后,几期Target杂志继续深入讨论此问题。2003年瑞典哥德堡大学举办了一场工作坊,其论

文汇集成册，取名《翻译学新趋势》(New Tendenc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ijmer and Alvstad 2005)，多位学者达成共同意愿，要将翻译研究方法集中起来共同研讨审视。该书的编者在前言中略为低调地指出(同上：1)，翻译学“一直努力摆脱规定性翻译研究，转而考察翻译的实际状况。在这样的框架下，关于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选择至关重要”。这种选择非常关键，而且取决于研究目标和研究者。随着本书渐渐深入，我们将发现研究方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随着翻译学研究从字词发展到篇章，从社会文化语境，再到译者自己的工作方法，研究方法彼此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典型的例子就是关注译者的“惯习”¹²，所谓“惯习”是指一种通过社会活动和教育所培养性情网络结构，反过来又影响行为规范和传统的构建(Simeoni 1998: 21-2)。

翻译学研究的对象也随时间发生了变化，从前针对的是主要作为与语言教学手段的翻译活动，而今则注重研究翻译和译者运作的的环境。



小结

翻译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近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过去翻译被视作语言学习的方法，或者作为比较文学、翻译“工作坊”和对比语言学课程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翻译学这个学科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霍姆斯的研究，他不仅提出了该学科的名称，还提供了本学科的结构图。理论、描述和应用翻译研究三个分支间彼此相连的关系奠定了最初的翻译学研究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学科的跨学科特征越来越明显，近年的研究分类更细，并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模式。

研讨要点

1. 你翻译的语言中采用哪些词表达“翻译”的概念？弄清它们的渊源。你认为这些词的使用如何反映了“翻译”概念的形成？参见切斯特曼

(Chesterman 2006) 的分析。

2. 研究其他术语的使用情况，如“改编”，“译文”和“创译”？这些术语在什么语境中使用？给它们下定义是否困难？依据你的研究，试着给“翻译”下定义。
3. 调查翻译学研究在你们国家大学体系中的位置，有多少大学提供“翻译学”（或相似的）硕士或博士课程？通常设在哪些院系？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和“次要”关系如何？关于翻译学在你们国家的地位，你能得出怎样的结论？
4. 参考图1.1和图1.2，想一想你自己的研究处于图中的什么位置。
5. 浏览最近几期像Meta和JosTrans这样容易在网上获取的电子期刊（有条件的可以看看Target, TTR, The Translator或其他期刊），试着将每篇文章纳入到霍姆斯/图里的翻译学结构图中（表1.1和表1.2）。这样做容易吗？有什么问题？再用范·道斯莱尔的结构图做同样的练习，并与上面的结果相比较。

（张春玲 李德凤译）